

序言

卢龙光 林精华

《圣经》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遗产，有如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四书五经等一样有充分的文学和美学价值。这种价值通过翻译，即从原文的希伯来《旧约》和希腊文《新约》，到拉丁文圣经、德语、英语、西班牙语、马来语、俄语、汉语、日语等圣经之出现才传播到全世界的。至今，圣经是全球译本最多，长期占出版、印刷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

其实，圣经是一本具有双重性质的名著，一方面是宗教的神圣经典，希伯来文旧约孕育了犹太教以及间接影响了伊斯兰教，而旧约与希腊文的新约则孕育了基督宗教（包括了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另一方面圣经是一本超越宗教而对世界文明有伟大贡献的著作，因此阅读者和研究者皆不限于宗教信徒。研究的角度可以从信仰的角度，也可以只从文学、哲学、历史、美学等角度。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带来人的自我觉醒，对任何事物皆采取批判和质疑的态度，这包括从人的角度对圣经的批判、评鉴。十八世纪科学开始茁壮，同时发展了以科学方法研究圣经，从十九世纪开始的科学化圣经研究，¹最重要是发展了历史文献圣经评鉴法（historical literary criticism），研究圣经各经卷及章节在不同历史处境中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宗教历史等的关联；另外亦运用文学的方法研究圣经，包括将考

¹ 参 R. E. Clements, *A Century of Old Testament Study*, rev. ed. (Guildford: Lutterworth, 1983) 及 John K. Riches, *A Century of New Testament Study* (Valley Forge, P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93)。

古学发现的古老经文残片并合成最古老的文本（textual criticism），探讨当代的语文及语意作评鉴（linguistic criticism），从经文的不同文学体裁及形式作评鉴（literary and form criticism）等，从而找出这些经卷的原意，包括哲学、宗教及人类的生活经验与智慧。这种对圣经的研究并不规限与宗教信仰的关系，而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追寻。

十九世纪的历史文学评鉴法，到二十世纪进一步发展到如编修批评法（redaction criticism），修辞批评法（rhetorical criticism）、结构评鉴法（structural criticism）、论述评鉴法（narrative criticism），社会科学评鉴法（social-scientific criticism）及以社会知识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发展出来的新文学评鉴法（new literary criticism），就是撇开历史处境去寻找经文内存的文学世界。这些不同的研究进路，分别是以读者、研经者的背景，受众的背景，经文形成及传递历史处境和文本接受史等为本的研究，如妇女研究，社群研究，后殖民研究及受容史研究（reception history of biblical studies）等。

这些研究的进路和关注点其实可以归纳为三方面的特点：一、以经文本身为本（文本，体裁，语文，文学，经文之世界等）；二、以经文之背后为本（处境，作者，社群，受众等），三、在经文前面之主体为本（诠释者的处境、角度，诠释受众及诠释时所使用之诠释工具，包括现代的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哲学及宗教学等理论模式）；可以说是多彩多姿。²

圣经和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相信早在唐代公元第七世纪时已经随着景教的传教士传入中国，可惜没有留下任何有关圣经翻译为中文及传递的手稿。³存留至今的汉语圣经译本，最早的是天主教神父白

² 参卢龙光：〈圣经：基督教的基础——历史与诠释〉，载《圣经与文学阐释》，梁工、卢龙光编（北京：人民文学，2003），175-200。

³ 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迄今为止基督教早在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已经传播到中国的证据。该碑共有1,900个汉字，其中提及「真经」、「旧法」、「经二十七部」和「翻经建寺」等语；而1980年在敦煌石窟发现了唐代景教文献《尊经》的书目，这些都是有关景教翻译圣经的证据。在13世纪，天主教开始传入中国，在1305年天主教的北京主教寄给罗马教宗的信中，提到他已将《新约》和《圣咏集》译为鞞鞞文；可惜以上提及的圣经翻译的稿件至今全部没有发现，参J. O.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1989)，中译：尤思德：

日升译本，可能是 1700 至 1705 年完成，主要包括了新约的大部份。⁴ 被认为是第一位在中国人的处境完整地翻译整本圣经为中文的基督教首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他在 1823 年完成并出版。⁵ 其后之传教士继续翻译圣经为中国各地的地方语言、文言文、白话文，以及创制了 12 种以上的少数民族文字去翻译少数民族使用的圣经。⁶ 圣经成为了在中国历史上，翻译版本最多，汉语文字表现形式最多，中国方言文字形式及少数民族文字译本最多，而且是近代史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书籍。⁷ 然而，相对于中文圣经翻译工作而言，圣经的学术研究在中国起步较迟。在研究人才培养方面，包括圣经原文及诠释各书卷的学者等，仍然非常缺乏。⁸

但是过去 20 年，学术界配合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努力与时俱进，自 2002 年至今，分别在河南大学(2002)，⁹ 南开大学(2005)，¹⁰ 东北师范大学(2008)，¹¹ 厦门大学(2012)¹² 和最近一次的首都师范大学(2015) 举行了圣经研究的学术会议，凝聚了不少中国的圣经学者，发

《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蔡锦图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13-14；赵晓阳：《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20-21。

⁴ 包括《四福音书》、《宗徒大事录》、《保禄书信》及《希伯来书》第 1 章，参赵晓阳：《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25-26。

⁵ 1822 年和 1823 年分别由身在印度的马士曼和在中国的马礼逊完成了两部完整的中文圣经，虽然马礼逊的译本较马士曼迟了一年出版，但是马礼逊在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地位，其译本被认为是最早的中文圣经；参上注，31-57。

⁶ 参蔡锦图：《圣经在中国》（香港：道风书社，2018）。

⁷ 赵晓阳：《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1。

⁸ 卢龙光：《圣经研究对中国教会及社会的挑战》，载 *Honouring the Past, Looking to the Future*, ed. Gale A. Yee and John Y. H. Yieh (Hong Kong: Divinit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6), 605-6；自 2015 年之后情况有好转，由香港中文大学培养的旧约研究博士回到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南京大学等任教；近年来，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也有从希伯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培养的圣经研究博士担任教席。

⁹ 梁工、卢龙光编：《圣经与文学阐释》，参前注 2。

¹⁰ 卢龙光、王立新编：《〈圣经〉文学与文化：纪念朱维之教授百年诞辰论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¹¹ 刘建军编：《〈圣经〉研究与文学阐释：「西方宗教文化与文学」学术研究会论文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¹² 王诺编：《经典诠释与文学文化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表了关于圣经汉译，经文理解，文学诠释及文本之外的阐释等论文。本文集就是 2015 年 10 月 22 至 24 日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举行的「圣经及其文学阐释」国际会议中所发表的 68 篇论文中选取的 31 篇文章，希望对圣经的中国化研究方面有贡献。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领导及各方面协助此次会议的工作人员大力支持，使这次会议圆满成功。特别是文学院院长马自力教授同意出资出版这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负责出版及使用「传经」专款资助，我们都非常感激。希望在各方的努力和鼓励下，在中国的圣经研究将来可以取得更大成果。